

德国比较教育学发展脉络：研究主题、 学科基础与人物

肖军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摘要] 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其研究主题以东西方国家教育比较及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研究为主；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研究主题主要为跨文化教育和国际教育。德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化程度较低，有十余所高校设有比较教育学讲席，其中汉堡大学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镇；德国共有3种重要的比较教育学期刊，“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分会”是学科交流的最重要平台。德国有较多国际知名的比较教育学者。整体来看，德国比较教育学目前处于“失意”和“复兴”之间。

[关键词] 德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3)05-0021-09

DOI: 10.20013/j.cnki.ICE.2023.05.03

在欧洲，德国比较教育学处于领先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涌现出了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等国际知名比较教育学者。比较教育学也在“二战”后快速学科化，在大学建立了巩固的阵地。尤其是冷战的开始，促使德国比较教育学发展达到顶点。冷战结束后，德国比较教育学开始衰落，许多比较教育学讲席和比较教育研究机构被取消。直到大规模国际学业测评的兴起，德国比较教育学才展现出复兴迹象。透过德国比较教育学整体发展脉络，也可以观察到当今世界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态势。因此，本文从学科制度的视角对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梳理，以增进我国学界对德国比较教育的了解，并对比较教育的未来发展进行思考。

一、德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主题

虽然比较教育学界公认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为比较教育学的鼻祖，并以此认定比较教育学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各国大学开始开设比较教育学专业和课程，比较教育学才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可。^[1]1931年，第一份国际公认的比较教育学期刊《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由德国学者施奈德创立。德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国际比较教育学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本文将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①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每一阶段的研究主题各有侧重。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

基金项目：杭州师范大学环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环波罗的海国家国际与比较教育发展及合作研究”（项目编号：HBZXYB2023）。

作者简介：肖军，男，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①在德国分裂时期，本文介绍的德国比较教育发展主要指联邦德国比较教育的发展。

年代至今。特别是1990年这一时间点，成为德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分水岭。^[2]

（一）东西方国家教育比较及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研究

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冷战和德国分裂的时代背景下，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呈现出了一种对称式发展模式，双方都存在3种研究方向。即对东西方国家教育系统的自身研究和相互研究，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比较，同时双方也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展开研究。因此，对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的教育研究成为联邦德国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3]东欧教育研究不仅仅是将东欧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空间，而且也是将其作为解读社会主义体系的一种密码。^[4]在东欧研究中，民主德国和苏联是联邦德国比较教育的重点研究对象，其他国家则处于相对边缘地位。研究重点包括东欧各国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思想、意识形态、学校组织等。^[5]许多著名的德国比较教育学者都是在东欧国家长大，比如弗勒泽（Leonhard Froese）在20世纪20年代从乌克兰返回德国，米特（Wolfgang Mitter）是从捷克移民德国。^[6]这些学者不仅具有语言优势，而且对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也更加了解。

在从事东西方国家教育研究外，一些学者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显示出兴趣。随着“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南北国家间的冲突日益加剧，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研究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成为联邦德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鉴于之前对教育援助的批评，第三世界教育研究没有以“文化输出”为目的，而是以彼此的学习为重点，交流项目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制定教育政策文件和备忘录，确定教育理论和研究中的战略立场，与教育援助和科研援助组织紧密合作，推进和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教育研究项目，并为双方的科研合作项目筹集资金。^[7]

（二）跨文化教育学的国际教育学

冷战结束以及柏林墙的倒塌使德国比较教育学发生重大转向，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促成了跨文化教育学的国际教育学的崛起。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一直处于比较教育研究的边缘^[8]，最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融合在广义的跨文化研究中。自20世纪50年代初，欧洲国家开始大量吸收外国劳工。移民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成为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关注点。^[9]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跨文化教育在联邦德国发展成为一门特殊的教育学科或者分支学科。^[10]1992年，德国“跨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移民问题及其对教育系统带来的影响，倡导发起了一系列研究项目，希望为融合多元文化作出贡献。同时，该委员会直接以实践为导向，努力改善学校教育和教学，促进学生、教师、当地社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原来的“国际化”转变为了“在地国际化”，原来的“外国人”转变为了本国的“移民后代”。这些都为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跨文化研究也由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理解扩大到本国不同民族、族裔间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融合。

在20世纪之前，欧洲的比较教育学都是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并以文化研究为主要范式，民族国家间的教育系统比较占据着学科主导地位。正如汉斯（Nicholas Hans）所言：“第一步就是以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每个民族国家系统，以及它与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11]“二战”后，全球化成为推进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的重要因素，比较教育学的分析单位从原来的国家、社会、文化扩大到“世界社会”（Weltgesellschaft）和世界系统，教育进入了一种全球碰撞、扩散、吸收、交织的过程。^[12]这种相互联结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系统与变化过程增加了比较教育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国际教育学成为与比较教育学并列的部分。^①这也给德国比较教育学带来

①国际教育学在美国兴起较早，1968年美国“比较教育学会”更名为“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2005年，德国“第三世界教育研究委员会”和“比较教育委员会”才合并成立新的“比较与国际教育委员会”。

两种主要影响：一是探究一种“欧洲化的教育”或曰“欧洲教育的一体化”。“欧洲化”可以视为“全球化”的一种地域变种。“欧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地缘概念，而且更是作为一种促进欧洲融合的政治进程。这一进程不仅仅受到政治和市场的调控，而且更注重形成一种社会意识，一种共同的“欧洲认同”^[13]，而促进“欧洲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教育。比较教育学者致力于制定学业评价的标准，促使各级教育成就具有等值性，消除各国教育交流间的樊篱，并在各国教育中融入“欧洲意识”。“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Programme）以及“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等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二是国际教育研究兴起。在国际教育领域，跨境教育、国际组织倡导的教育政策、全球教育制度趋同、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全球知识型社会、国际理解教育、全球学习、国际大型学业测评等主题成为德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尤其在2001年首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德国学生糟糕的成绩震惊了德国。此后，德国针对国际学业测评的比较研究急剧增多，力图为德国教育改革提供决策支持。PISA研究成为21世纪后德国比较教育研究最大的热点，也成为比较教育学在德国学

术界复兴的标志之一。^[14]自2012年PISA测评以来，“德国国际教育比较研究中心”开始负责在德国开展PISA测试，并对结果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该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由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基尔大学莱布尼茨科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联合创建。此外，国际学业大规模测评也带动了德国两类研究。一是为了探究榜样的力量，德国开始了对芬兰、瑞典等学生PISA成绩较高国家的教育系统和教育治理模式开展研究。学校教育治理比较研究成为近十几年来的热点。图宾根大学的阿莫斯（Karin Amas）教授是研究国际教育治理的重要学者。二是因为德国移民后代的PISA成绩落后，凸显了教育中的阶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由此也带动了文化认同、支持移民后代学生学业发展的研究。

因为“比较教育研究经常有意地亲近政策和行政管理”^[15]，为国家的教育改革提供域外经验和借鉴，所以德国比较教育的研究重点也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二战”后服务于冷战的东西方国家教育研究到服务于欧洲团结的欧洲教育研究，再到服务于移民融合的教育系统改进。当前，德国比较教育研究集中于以下主题，详见表1。

表1 德国比较教育研究主题一览表

比较视角	国际视角
针对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教育概况研究	针对国际/跨文化教育实践的研究
理论导向的/检验假设的国别研究	针对国际/跨文化教育学的分析和比较
根据专题问题进行的国别比较	国家和国际政策咨询方面的专业知识
针对大规模测试进行的全球比较研究	国际教育政策趋势（例如国际组织的角色、教育治理）
区域研究（一个区域内几个国家的比较）	国际化对教育的影响
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比如欧盟）	分析跨境移民对教育和教育政策的影响
针对跨国教育空间和教育组织的研究	对跨文化教育实践以及民族认同的研究

来源：ADICK C. Das Potenzial der Vergleichend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 zwischen elaborierter Vergleichsmethodik und praktischer Bedeutsamkeit[J].Tertium Comparationis, 2015,(21)1: 105-129.

二、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学科基础

（一）校内系所和校外研究机构

在德国，除了汉堡大学、洪堡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马格德堡大学、海

德堡大学、科隆大学、明斯特大学、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奥格斯堡大学、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和帕德博恩大学，其他高校都没有正式的比较教育学讲席，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都隶属于其他讲席或研

究团队。^[16]其中,汉堡大学是德国比较教育学的重镇,是德国最早设立比较教育学讲席的学校,很多从事比较教育的学者都是从这里毕业或曾在这里任教。汉堡大学在教育学院设置了“普通教育、跨文化与国际比较教育、教育心理学系”,有一个比较与跨文化教育研究团队,并开设了“多语种和教育”(Mehrsprachigkeit und Bildung)硕士专业。波鸿鲁尔大学比较教育研究团队早年由安维勒(Oskar Anweiler)、阿迪克(Christel Adick)坐镇,也有很强的科研实力。明斯特大学的比较教育学讲席由阿马拉尔(Marcelo Parreira do Amaral)领导,在硕士专业“教育理论”中设置了“跨文化、国际与比较教育模块”,并且拥有“德国和美国教育史”研究团队,该团队致力于历史上和当代的德国和美国教育交流研究。洪堡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学”讲席在施瑞尔(Jürgen Schriewer)退休后由沃尔多(Florian Waldow)领导,继续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同时国际化问题和教育经验吸收转化也是其研究重点。海德堡大学的“国内国际教育研究”讲席由尤德(Nina Jude)教授领导,主要从事各国教育系统比较以及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艾希施泰特天主教大学的“历史和比较教育学”讲席则偏重于教育史和拉丁美洲教育的研究。除汉堡大学外,其他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团队及其所构成的单位规模都较小,由一名讲席教授加若干博士生组成。此外,虽然一些大学没有比较教育学方向的讲席,但是也有一些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散落于普通教育学、教育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中,比如图宾根大学的阿莫斯、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的科诺布洛赫(Phillip D. Th. Knobloch)。在专业设置上,德国几乎没有高校设置比较教育学硕士专业,大部分学校只是开设一些比较教育学方向的本科和硕士课程。

除大学外,德国还有一些重要的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科研机构,比如始建于1951年的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该研究所以国际视角对学校质量和学校治理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国际比较为德国教育改革提供支持。此外,该研究所的“学校教学质量部”还参与一些国际大型教

育评估项目,比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和“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2018年,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搬迁到法兰克福新址后更名为“莱布尼茨教育研究和教育信息研究所”。位于柏林的马克思-普朗克教育研究所也是重要的比较教育科研机构之一。该研究所于1961年由贝克(Hellmut Becker)倡议建立,贝克担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吸引了当时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罗宾逊(Saul B. Robinsohn)和戈尔德施密特(Dietrich Goldschmidt)加入。研究所着重对东西方工业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其对社会转变过程中学校改革的研究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促进了传统的比较教育学向比较的教育研究的转变。^[17]但是当前该研究所并不主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甚至并不完全以教育为研究方向。该研究所的德语名称仍为“马克思-普朗克教育研究所”,但其英文名称则为“马克思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Max Plank 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致力于人类发展和教育过程的跨学科研究。

总体来看,德国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所减少,特别是“二战”以来,在一些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去世后,一些比较教育学讲席被取消或改变方向,比如莱比锡大学和马堡大学。一些专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科研机构也改变了研究方向,并不以比较教育研究为特色。

(二) 刊物

学术期刊是学者们展示和交流学术观点的平台,是一个学科建立的标志之一。学术期刊设定了学术规范,引领学术发展,是促进学科进步的重要推力。在德国有4种重要的比较教育学期刊。第一种是《国际教育研究与发展教育学期刊》,创刊于1978年,每年出版4期。该刊致力于探究社会发展过程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对教育、对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全球教育合作带来的挑战。第二种是《比较点: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学》,创刊于1995年,每年出版两期。该刊发表比较教育学、国际教育学和跨文化教育学的文章,基于德国和欧洲的经验来讨论全球化进程和文化交流对教育系统的

影响。这两种期刊目前都属于瓦克斯曼出版社，并与德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委员会”合作，其编辑团队成员包括“比较与国际教育委员会”成员，期刊也会定期单独发布委员会的新闻。第三种是《移民教育研究》。移民教育问题是德国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该期刊也成为德国跨学科移民教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并致力于提高移民研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呼吁在跨学科合作的基础上寻找并解决研究中的盲点。该期刊每年出版两期，每期设定一个主题。此外，《国际教育评论》也是德国比较教育学者发表学术文章的一种重要期刊。该刊创立于1931年，虽然在1943年至1947年间和1951年至1955年间出版中断，但该刊仍被认为是世界上发行时间最长的国际教育期刊。“二战”后，该刊由位于汉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接管，并于1955年复刊。该期刊以德语、法语和英语发表有关国际比较教育学的文章，目前聚焦于各国终生学习教育主题。

（三）学会

1961年5月，欧洲比较教育学者在伦敦召开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了“欧洲比较教育学会”（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in Europe）。回国后，参加此次大会的9名德国学者也召集成立了德国“比较教育工作小组”，由当时汉堡大学比较教育学讲席教授豪斯曼（Gottfried Hausmann）担任组长。阿迪克认为，伦敦比较教育学大会是欧洲比较教育学和德国比较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共同的诞辰。1963年联邦德国教育学会成立，弗勒泽、希尔科尔（Franz Hilker）、迪特里希（Thel Dietrich）立即向教育学会提交了成立比较教育委员会的申请，但是没有得到回应。直到1966年，原来的“比较教育工作小组”才转变为“比较教育委员会”，成为德国教育学会的第一个委员会，它同时也是“欧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员。^[18]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德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也产生了分化。由于受到冷战中东西方对峙的时代环境影响，一些比较教育学者致力于对东西方国家教育体系进行比较研究。除了冷战背

景外，“二战”后的去殖民化进程也产生了众多独立的新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于是，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这些比较教育学者更多地关注比较教育学能够为这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文化。^[19]1978年“比较教育委员会”产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会员组织成立了“第三世界教育研究委员会”。但是这两个委员会都隶属于德国教育学会，有些学者同时具有两个委员会的双重会员身份。^[20]1992年，德国教育学会成立一个新的“跨文化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移民及其对教育和教育系统的影响，并试图探索用更好的方式帮助移民后代融入德国学校系统。起初，“跨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比较教育委员会”并没有太多联系，但是在1997年，德国教育学会启动了改革进程，将一些研究方向相似的委员会整合为“分会”（Sektion）。因此，“比较教育委员会”“第三世界教育研究委员会”“跨文化教育委员会”于1999年合并为一个新的“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分会”，成为德国教育学会14个分会之一。这3个委员会也开展了许多合作研究。^[21]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三个世界”的概念逐渐让位于“全球化”概念，针对“第三世界”的教育研究也呈现萎缩的趋势。2005年，“第三世界教育研究委员会”和“比较教育委员会”合并为“比较与国际教育委员会”。此后，“可持续发展教育委员会”又并入“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分会”。因此，当前的“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分会”仍然包含3个委员会，即“比较与国际教育委员会”“跨文化教育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委员会”。在国际上，德国“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分会”曾是“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和“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的成员单位。^[22]

三、人物

德国有一批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较教育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推动了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而且也对欧洲比较教育学有重要影响。本文按照年代和作用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一）比较教育学的拓荒者

施奈德、默克 (Walther Merck)、希尔科尔都出生于19世纪末期，是德国最早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可以被称为“德国比较教育学的拓荒者”和“第一代学者”。他们为德国比较教育学播下种子，为比较教育学的开端作出了重要的个人贡献。

施奈德（1881-1974年）出生于科隆，1923年任科隆大学编外讲师，1928年任波恩师范学院教育学及心理学教授，同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31年，施奈德从美国回国后创办了三语期刊《国际教育评论》，1946年成为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教育学教授，并在那里创办了比较教育学研究所，后来又回到慕尼黑大学继续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直至1960年退休。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教师心理学、教学论、家庭教育以及比较教育理论。“二战”后，施奈德出版了比较教育学重要著作《国民教育的原动力：比较教育学导论》《德国教育学在国外的应用和影响》《比较教育学：历史、研究和教学》。施奈德属于因素分析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比较教育学要探究维持各国教育制度的内在因素，即教育的推动力。为了找出这些推动力，需要从各国教育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到“比较点” (Tertium Comparationis)，并以此“比较点”对各国教育零散的教育现象进行整合、分析。^[23]

默克（1892-1964年）出生于柏林。默克具有丰富的一线教育工作经历，担任过汉堡教育局官员和凯兴斯特纳高级实科中学校长。由于他的国际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默克在纳粹政权上台后被剥夺了校长职务。从1950年到1959年退休前，默克一直担任汉堡大学比较教育学讲席教授。该讲席是德国第一个，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的比较教育学讲席，对于比较教育的学科化具有重要意义。1952年到1955年，他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该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教育合作、举办国际教育会议和进行比较教育研究。^[24]一直到1962年，默克一直参与该所期刊《国际教育评论》的编委会工作。默克深受凯兴斯特

纳 (Georg Kerschensteiner) 教育思想影响，秉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对各国先进的教育思潮和实践持开放态度，“国际理解教育”一直是他的核心关注点。^[25]

希尔科尔（1881-1969年）出生于威斯特法伦。他具有丰富的一线教育实践经历，做过文理中学的艺术教师、高级督学、黑森州教育部高级管理员，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并认为比较教育学的任务不能仅限于理论的自给自足，而且要为教育改革提供支持。他于1948年创办了教育期刊《教育与教养》，该刊是德国教育学会的会刊。1962年，希尔科尔出版了德国比较教育学奠基之作《比较教育学导论：历史、理论及实践》。他在书中阐述了比较教育学的任务、方法和目标，并以量化和质性的视角对不同的教育系统进行了比较，希望通过研究外国教育来推动德国教育改革。该书成为德国比较教育学入门的教科书。

（二）比较教育学的奠基者

“二战”后，比较教育学在德国快速发展，许多学者在大学设立比较教育学讲席，他们为比较教育学的概念化和制度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使比较教育学在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属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奠基者和第二代学者。这一批学者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他们大多数都具有移民背景，这使得他们具有对所研究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优势。^[26]这包括但不限于安维勒、米特、罗宾逊等学者。

安维勒（1925-2020年）出生于波兰，1947年至1952年在汉堡大学学习历史、日耳曼学、哲学和教育学，1964年任波鸿大学教育学讲席教授，直到1990年退休。作为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奠基人，安维勒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安维勒一生著述等身，且用多种语言写作，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大的知名度。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比较教育学研究、东欧教育学研究和德国教育史（包括东西德国教育系统比较）。他是“国际苏联和东欧研究理事会”（现为“国际东欧研究理事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德国“东欧研究协会”副主席。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民主德国的学校政策和学校系统》《学术兴趣和政治责任：比较教育研究的维度》与《20世纪东欧的教育和教养》。

米特(1927-2014年)出生于捷克,博士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1964年至1972年担任吕内堡师范学院“普通和比较教育学”讲席教授,同时在汉堡大学教授比较教育学。1972年至1998年期间任职德国国际教育研究所“普通与比较教育部”主任,期间担任两届研究所所长职务。1981年至1985年任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1991年至1995年任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会长。米特担任过《国际教育评论》和《教育和教养》的期刊编辑。米特研究领域广泛,由于擅长捷克语和俄语,他的研究起初集中于苏联及东欧国家教育系统。他和安维勒一起领导了对东欧国家的教育研究,其著作至今仍是许多学者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史的重要来源,后来也涉及欧洲国家和非欧洲国家教育系统的比较。他的晚期研究则涉及教育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多元文化等问题,主要著作包括《比较教育学中的普遍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欧洲比较教育学》(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Europe)、《教育研究对欧洲教育政策的影响》(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Policy in Europe)。^[27]

罗宾逊(1916-1972年)出生于德国,1933年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历史、社会学、哲学和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希伯来大学工作,并积极参与以色列教育部课程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以色列教育一直都是罗宾逊的研究内容之一。1959年,罗宾逊回到德国,担任位于汉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所长。1964年,罗宾逊搬到柏林,担任马克思-普朗克教育研究所所长,专注于课程和比较教育研究,使得“课程”这一概念取代了“教学计划”在德国流行起来。1972年,他在柏林的家中意外去世,享年55岁。去世前,罗宾逊正处于科研黄金期,此时他正担任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会

长,在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比较教育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领导了大量科研项目,致力于以国际比较的视角来改进西德的教育系统。作为一名国际主义学者,他以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立场来研究共产主义教育,并坚定地 and 东欧国家开展教育合作。

(三) 比较教育学的创新者

施瑞尔(1942-)出生于德国,博士毕业于维尔茨堡大学,职业生涯略晚于第二代学者,他是探索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而闻名的比较教育学者,1975-1991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两德统一后,施瑞尔受邀参与洪堡大学的重建,自1991年至2010年任洪堡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讲席讲授,现为荣休教授。他和韩友耿(Jürgen Henze)教授^①一起使该研究中心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之一。施瑞尔具有极大的国际影响,担任过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和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常设研究委员会(Standing Research Committee of WCCES)主席,英国《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期刊编委会委员。施瑞尔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比较教育学先后受到偏向哲学与历史的研究方法和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单一的方法已经无法解释教育问题和教育现象的复杂性。面对比较方法自身的缺陷和当代社会的新形势,施瑞尔借用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的功能结构理论提出了他所称的“比较-历史”(comparative-historical)研究方法。施瑞尔认为,比较教育学必须进行历史的探究,但是如果只集中于历史的研究来进行比较,那么则难以发展出可应用的一般性法则。所以应该将二者以系统的观点加以检视,并借由系统分化与自我检视的过程来面对不断变迁的复杂因果关系,以及发现其趋势与法则。^[28]

四、结语

2015年,洪堡大学沃尔多教授在《比较点:

^①1993年,韩友耿成为洪堡大学教授,并于2021年退休,其研究专注于东亚教育,特别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是德国著名的中国教育研究专家。

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学》上发表文章，标题十分简洁醒目：“比较教育学走向死亡了吗？我们还需要它做什么？”在德国学界，比较教育学也存在着严重的学科认同危机。很多学者认为，比较教育学与其说是一门定义明确的学科，不如说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教学和研究领域。^[29]近20年，教育学科中运用比较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多，国际大规模学业测评也刺激了比较方法的运用。“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如此成功反而使“比较教育学”丧失了其独特特征，似乎正在走向衰落。^[30]相比于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德国比较教育学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德国没有比较教育研究生院，专门的研究生课程也非常少，一些高校里的比较教育学讲席被取消或者改成其他方向，从前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校外科研机构也转向其他研究方向，德国“国际与跨文化比较教育分会”也退出了“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但是失望中孕育着希望，科特霍夫（Hans Georg Kotthof）认为，德国的比较教育学处于“失意”与“复兴”之间。如何走向复兴，比较教育学者要专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比较教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这是未来比较教育学的重要任务。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冲原丰指出：“即使比较研究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学的全部领域，比较教育学仍然有其特殊的使命，其中之一便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精益求精的改进”^[31]。比较方法要有更加系统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进而为教育比较研究提供方法支持。二是比较教育研究要加强其为教育政策服务的功能。比较教育学者以国际与比较的视角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问题，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这为比较教育学的存在提供了牢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EPSTEIN E. The Nazi seiz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view: a dark episode in the earl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J]. Comparative Education,2018, (54)1: 49-61.
- [2]BÖHM J. Überlegungen zum Gegenstandsbezug der Vergleichenden Pädagogik[M]// BÖHM J, STÜTZ R. Vielfalt in der Bildung.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2015:9.

- [3][8][10]GOGOLIN I.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Pädagogik[M]. Opladen:Verlag Barbara Budrich UTB, 2010: 104, 106, 95.
- [4]MITTER W. Das Bildungswesen in Osteuropa im Umbruch[J]. Osteuropa,1990,40(10): 909-924.
- [5][17] 胡劲松. 战后联邦德国比较教育研究评述 [J]. 比较教育研究, 1999(03): 2-7.
- [6][14][20][21]KOTTHOFF, H.G. Zwischen Renaissance und Bedeutungslosigkeit. Aktueller 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Vergleichend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J]. Tertium Comparationis, 2015,21(1): 6-26.
- [7]FLECHSIG K.H. Die Kommission "Bildungsforschung mit der Dritten Welt" [M]//GOLDSCHMIDT D. Die Dritte Welt als Gegenstand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r Forschung. Weinheim: Beltz, 1981: 290.
- [9]GOGOLIN I. Interkulturelle Bildungsforschung[M]// TIPPELT R, HERTHA B.S. Handbuch Bildungsforschung.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GmbH,2018: 353.
- [11]MITTER W.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Europe[M]// COWEN R, KAZAMIAS A M.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2009: 94.
- [12]LENHART V. Die Globalisierung in der Sicht der Vergleichend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J]. Zeitschrift für Pädagogik, 2007, 53 (6): 810-824.
- [13]HÖRNE W. Europa als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issenschaft[J]. Tertium Comparationis, 2004,(10)2: 230-244.
- [15]于尔根·施瑞尔“比较教育学”：一个让人误解的名称？——论统一的概念和不同的逻辑 [J]. 孙进, 燕环, 译. 比较教育研究, 2022, 44(02): 3-15.
- [16][19]SCHEUNPFLUG A, GREGOR L W, MASASHI U. Entwicklung und Herausforder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J]. ZEP: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ildungs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spädagogik, 2006 (29)1/2: 58-62.
- [18]ADICK C. 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eine Einführung[M]. Stuttgart:W.Kohlhammer GmbH,2008:25.
- [22]WATERKAMP D. Geschichte der Sektion[EB/OL].(2022-08-01)[2022-08-01]<https://www.dgfe.de/sektionen-kommissionen-ag/sektion-3-interkulturelle->

- und-international-vergleichende-erziehungswissenschaft/ueber-die-sektion/geschichte.
- [23] 蔡明昌. 施耐德 [EB/OL].(2000-12)[2022-08-01]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3752/>.
- [24] 梁福镇. 比较教育学: 起源、内涵与问题的探究 [M]. 中国台北: 五南出版社, 2013: 19.
- [25] UNESCO-Institut für Pädagogik. Auf dem Weg zu einer lernenden Welt 50 Jahre UNESCO-Institut für Pädagogik[M]. Hamburg: Druckerei in St. Pauli, 2002:60.
- [26] HÖRNER W. Nachruf auf Prof. em. Dr. Dr. h.c. mult. Oskar Anweiler[EB/OL].(2022-08-01)[2022-08-01]https://www.dgfe.de/fileadmin/OrdnerRedakteure/Sektionen/Sek03_SIIIVE/2020_Nachruf_auf_Oskar_Anweiler.pdf.
- [27] 南洋理工大学. Short Biography[EB/OL].(2014-11-13) [2022-08-01] <https://nie.edu.sg/research/cie/cyclopedia-org/cie/cyclopedia-org-a-to-z-listing/mitter-wolfgang>.
- [28] 陈仲翰. Jürgen Schriewer 的“比较-历史”观点及其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之蕴意 [J]. 南台人文社会学报, 2009(1):31-54.
- [29] AMARAL M P, AMOS K. Internationale und 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Theorie, Methode und Forschungsfelder[M]. Münster: Waxmann Verlag GmbH, 2015: 7.
- [30] WALDOW F. Hat sich die 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issenschaft zu Tode gesiegt? Wozu brauchen wir sie noch? [J] Tertium Comparationis, 2015(21)1: 130-139.
- [31] 常媛媛. 施瑞尔系统功能主义比较教育学理论分析框架研究 [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1: 36.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Topics, Discipline Basis and Protagonists

XIAO Jun

(Jinghengyi Education School,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opics of Germ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firs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o the late 1980s, the comparison of educ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mainly. Second, after the 1990s,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ose. The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Germany is relatively low.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universities with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airs, of which Hamburg Un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journal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latform for Discipline exchange. There are many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mparative education scholars. On the whole, Germa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 between "frustration" and "revival".

Key words: Germany; comparative education; discipline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曾晓洁